

· 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文库 ·

走向“最后关头”
——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

著 者 〔美〕柯博文 方 译 马俊亚
译 者 马俊亚

出 版 人 谢寿光
出 版 者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4 号
邮 政 编 码 100029
网 址 www.slcnet.cn
责任部门 编辑中心
责任编辑 宋培军 刘保富
责任校对 咏 湖
责任印制 同 非

总 经 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经 销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客户服务中心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 32 开 90 毫米 × 64 毫米
印 张 10
字 数 20 万字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定价 25.00 元
著作权合同 图字 01-2005-000000 号
登 记 号 图字 01-2005-000000 号
定 价 2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1
鸣 谢	1
前 言	1
第一章 满洲、上海和不抵抗	1
不抵抗的背景：南京与日本（1927～1931 年）	9
中国的军事和政治的联合（1927～1931 年）	19
对不抵抗的挑战	24
一·二八事变	31
一·二八事变的遗产	44
第二章 “攘外必先安内” 政策及其反对者	50
政府内部的政治困境	53
东北的抵抗	64

南京与抵货运动	69
群众对不抵抗的反应	72
邹韬奋与《生活》期刊	77

第三章 北方的新危机：山海关、热河和

《塘沽协定》	87
对热河危机的反应	95
长城抗战	100
黄郛与《塘沽协定》	106
对《塘沽协定》的反应	113

第四章 《塘沽协定》与中国政治 120 |

冯玉祥与民众抗日同盟军	122
日本问题与南方政治	132
塘沽与南京政权的政治结构	137

第五章 1934 年南京的妥协政策 151 |

天羽主义	156
关税和贸易问题	166
与“满洲国”的通车通邮	171
“攘外必先安内”的重申	180

第六章 敌乎？友乎？	188
中日亲善？	193
关东军反对和平举措	202
《何梅协定》与《秦土协定》	211
《新生》事件	223
危机的后果	232
“蓝衣社”在华北	237
 第七章 直到和平无望	253
南京的政治骚乱	266
中日经济提携	274
1935 年 11~12 月的自治危机	280
和平内阁	292
 第八章 群众的抵抗浪潮	298
邹韬奋与全国救亡运动	305
日本的态度变得强硬	314
日本支持的华北走私	321
国民党政治与抵抗问题（1936 年）	328
一连串的事件	335
绥远事件	345

第九章 走向冲突

——西安及其之外	355
西安事变	365
西安：没有回答的问题	375
日本与西安事变	386
战 争	396
 结 论	 400
征引文献	406
人名译名对照表	440
译 后 记	453

中文版序言

当开始写作《走向“最后关头”》时，我研究民国时代的中国已经好几年了。通过解读 20 世纪 30 年代发表的无数报刊文章，以及后来写成的回忆录，我深信中国人在这个 10 年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甚至在 1937 年 7 月全面战争爆发以前，日本问题也似乎主宰了中国的新闻报道。在我看来，西方学界对这段时期的研究，没有充分地讨论日本问题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许多学术著作陷入明显的框框中。西方的政治史偏重于像国民党或中国共产党这些政治团体的组织和活动。社会和经济史学家注重农村社会、农民、工业化和贸易。外交史学家考察南京、东京、伦敦、华盛顿和日内瓦这些政府层面问题的主要相互关系。现在西方学者似乎很少在这些领域之间进行相互交叉研究。自 1991 年《走向“最后关头”》首次出版以来，形势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改变。

特别是在美国，许多研究民国时期中国的外交史著作已重视与美国外交政策或国联的作用相关的问题。美国外交史学家似乎比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社会、经济和政治史的学者更少使用中文资料。我渐渐认识到这种隔膜已经导致西方学者无法把握大部分中国政治史中日本问题的重大意义。

当然，对于生活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人而言，日本帝国主义实际上不是一个外交问题——它是一个国内问题。日本侵略中国，占领了她的大量领土；日本（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的

战舰在中国的內河航行；像上海和天津这些城市的中国居民则生活在日本军队的影子之中。

为了全面理解这个问题的政治意义，我决定撰写一部主要是按年代排列的著作。我极为细致地考察了 1931 年至卢沟桥事变之间的入侵、事件和冲突。这项研究是非常细致的，但我认为这是理解主题的关键。一个又一个事件的无情压力不停地煽动着中国民族主义的火焰，它形成了 20 世纪 30 年代的历史。尽管这项研究的时段相对较短（仅有 6 年），但我相信中国政治和民族主义的思想被这些事件极大地改变了。到 1937 年夏，政治上活跃的中國人在准备抵抗。蒋介石无法继续实行妥协政策。

《走向“最后关头”》是为西方学术界的读者而写。尽管我知道许多中国学者已经读了这部著作，不少人还提出了极为中肯的评论，但我估计绝大多数的读者仍是属于西方的学者。本研究所用的大部分资料——报纸、期刊和回忆录——是在中国出版的，并在中国可以看到。但我仍然非常高兴本书能有机会译成中文。我此前的一部著作《上海资本家阶级与国民政府（1927～1937 年）》（哈佛，1980）出了两种中文版本。每次到中国，我都享受到与那里的同行讨论这部著作的乐趣。

不过，一部由西方学者所写的著作能给中国读者提供些什么呢？当然，答案是由读者决定的，但我可以提供一种可能性。尽管中日战争已在大约 60 年前结束了，但那场战争造成的问题在东亚仍然没有平息。战争反省问题、南京暴行的争论以及对慰安妇和强掳的劳工的赔偿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作为一名既非中国人也非日本人的西方学者，我大概可以提供一个局外的观点。在本书中，我并不准备着重强调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些罪行，无论如何，不去谴责或缩小它。我想做的是去理解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对中国政治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也许本书有时似乎忽略了中国人民的苦难。这不是我的本意。但在寻求理解这场战争的影响方面，也许一个局外人比一名中国或日本的学者更能提供一个不同的视

角。无论如何，我非常高兴本书能与中国读者见面，我将期待着您的评论。

我十分感谢南京大学马俊亚教授的翻译。我还感谢“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文库”的责任编辑杨群和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的张信教授，是他们促成了本书的翻译。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出版主任 John Ziemer 办理了版权事务。

美国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
柯博文

鸣 谢

我衷心感谢易劳逸在这项研究和本书撰写时对我的指导和鼓励。我也感谢高家龙、费正清、福格尔、罗伯特·D. 费厄雷、凯瑟琳·哈特福德、贺潇、戴恩·K. 肯尼迪、威廉·A. 谢拉德和叶文辛的广泛建议和帮助。这部手稿的各个部分曾作为论文提交给中西部地区中国问题研讨会、亚洲研究学会年会、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加利福尼亚中国问题研讨会、亚洲问题中西部会议、北部大平原史学会议、密苏里流域史学会议、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研讨会及费正清中心研讨会。作者感谢这些会议中进行评论及提出建议的许多与会者。

如果没有利用到一大批图书馆和档案馆的藏卷，这项研究是不可能进行的。我要特别感谢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孔飞力和使费正清研究中心成了我第二个家的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和帕特里克·G. 麦道克斯。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同样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台湾，我能够在阳明山国民党档案馆和“中央研究院”的近代史和三民主义研究所从事研究。在台湾，我的好友赖泽涵对安排我去上述研究机构给了很大的帮助。马若孟和胡佛研究所关于战争、革命与和平的东亚藏书工作人员对我访问他们的研究所一直予以慷慨的帮助。斯坦福东亚国家资料中心对我利用这些藏书也提供了旅行帮助。

我要感谢《亚洲研究学刊》允许我在这里重新发表我的论文《蒋介石与中国的抗日运动：邹韬奋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1931~1937》中的某些部分，这篇论文发表在该刊第 44 卷第 2 期（1985 年 2 月）。我要感谢莱斯利·赫伍德的绘图工作，感谢本杰明·G. 雷德及内布拉斯加大学历史系提供的资助。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出版部的编辑佛罗伦斯·特菲森和凯瑟琳·克勒姆一直对我予以莫大的支持。

这项研究的最终出版获得了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中国研究及学术协会美国委员会联合委员会的资助。我还要感谢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研究委员会提供的一个学期的休假及两个夏季的资金对这个项目的帮助，感谢艺术和科学学院通过赫普德基金提供的一个学期的假期。在 1980 年，我从美国健康、教育和福利部获得了教职人员研究委员会富布莱特—海斯研究基金，到台湾进行了为期 6 个月的研究。尽管如此，本书的结论、观点和其他论点为作者所得，不一定是上述研究机构及个人所得。

最后，我要感谢罗伯特·G. 鲁特和玛丽琳·马修斯·鲁特，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激励，这个项目可能永远也不会完成。

前 言

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的爆发，是酝酿仇恨的年代顶点。在蒋介石建立了政权后的10年中，日本帝国主义无情地围攻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蒋介石建立一个独立政府的努力遭到了日本进攻和威胁的不断压迫，如1928年5月的济南事变、1931年9月的九一八（奉天）事变、1932年的淞沪战役、1933年入侵热河及令人难堪的《塘沽协定》、1934年的天羽主义和藏本事件以及1935~1936年的华北自治阴谋，并最终在战争爆发时走向了极点。

蒋介石并不愿意与日本军事机器发生冲突。他认为自己的军队要逊于日本军队，并且，两国之间的战争对于中国以及对于他本人都是灾难性的。事实上，当1937年战争真的爆发时，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将要死去，而蒋本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中的地位也将被严重地削弱。对国内的考虑，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他的首要目的是击败国内的敌人——既有像阎锡山、冯玉祥这样的地方军事人物，也有中国共产党——并把对中国的控制牢牢地置于（他的）中央的权威之下。

因而，蒋介石想避免或推迟与日本的战争，对东京采取了妥协和安抚的政策。他宣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认为，在中国充分地团结起来抗击日本之前，国内的敌人——特别是共产党——必须予以消灭，在日本侵略东北时，他给东北军的总司令张学良打电报，指示他不要激怒日本人，而要依赖向国际联盟

的上诉。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蒋介石向在中国北方的日本官员授予了一系列“地方性的”居住地，而南京则直接与东京谈判更大的问题。安抚日本人及避免战争的企图在 1936 年 12 月的西安事变中也没有中断，直到 1937 年 8 月在上海爆发战争，它才被完全放弃。

这种妥协政策承担了巨大的政治风险。20 世纪 30 年代，妥协政策在中国并不得人心。情绪激昂的中国民众不断地要求抗日，倡导对东京调和的官员经常被无情地批评，有时还被暗杀（如唐有壬和杨永泰）。就像其政敌指责的那样，蒋介石通过不承担亲自批准不得人心的对日协定的责任，企图把对他个人的政治打击降到最小程度。他巧妙地让自己忙于“剿共”战争，而让像黄郛、张群、汪精卫这类官员来承担公共责任的压力。另外，妥协问题使整个南京政府丧失了在中国民众中的威望。

需要说明的是，就像本书对它们的使用那样，“民众”和“民意”并不真的是指全部或者甚至是中国人口中的大多数。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多数中国人可能并不知道《塘沽协定》或《何梅协定》。不过，这个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报刊的发行量一直在稳步地增长；在南京政府时期，大约有 5%~7% 的中国人经常阅读报刊。^①如果我们假定像产业工人和城市居民这样的半文盲能收听收音机和观看电影新闻，我们可以估算出 20 世纪 30 年代大约有 10% 的中国人关注公共事务。实际上，集中在都市、沿海地区有见识的公众的增加，一直是中国人的生活中重大的进步。

20 世纪最初的几十年，民意的增长几乎同时导致了一场强大的中国民族主义反帝运动的发展。整整一代中国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已经在五四运动这幕戏剧中受到了洗礼。日本在“二十一条”中的贪婪及对山东权益的保留使他们震怒，西方列强在凡尔赛对

^① Lin Yu-tang, *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p.148~149.

中国赤裸裸的出卖让他们痛苦，中国军阀政权的无能令他们愤慨，五四期间的青年充当了一场迫使北洋政府拒绝《凡尔赛和约》的运动的先锋。这种愤激的民族主义情感在 1925 年五卅运动中再次到达顶峰，尽管这场运动主要是针对英国，其次才是日本。由于印刷传媒的增长，学生和知识分子能够把他们的观点传给更多的听众。无可置疑的是，20 世纪 30 年代，仅有一小部分中国人深受民族主义者的鼓动，这一小部分人在政治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

国民党政府在许多方面是新民族主义运动在中国的一个产物。在 1926 年与五卅运动有关的反帝情绪的激昂浪潮中，蒋介石从广东发动了把中国统一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的北伐战争。国民党攻击军阀政权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并宣布了革命的外交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把“新中国”建成一个主权完整和独立的国家。因此，南京政权是在反帝运动的遗产上建立起来的。

从北伐时期革命的外交政策到 20 世纪 30 年代保守的南京政权及其妥协的政策，转变极为突兀。北伐的遗产使南京政府特别容易受到政治攻击，被指责放弃了革命的外交政策并背叛了整个五四—五卅民族主义运动。对日绥靖政策尤会招致唾骂。九一八事变之后，示威、抵货甚至攻击日本公民的事件在中国比比皆是。东京要求南京对这些事件负责，并坚持如果南京真的希望妥协，它就要镇压群众的反日活动。南京通常予以同意，因此它好像是充当了日本人的代理人，保护日本人的在华利益，与旧的军阀政权几无二致。

蒋介石的许多文武之敌——也许真的被妥协政策所激怒，但显然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政治机遇——恶意地来攻击他。几乎所有蒋的对手都一次又一次地披上“抗日”的外衣，公开攻击蒋迎合日本人的要求。1930 年北方联盟失败后，势力每况愈下的冯玉祥将军组织了民众抗日同盟军，试图东山再起。在福建，反叛者利用他们 1932 年上海英雄立场的遗产作为他们反蒋运动的柱石。广东的西南领袖因害怕蒋会镇压其自治，在 1936 年打

出了抗日大旗来反对南京。在江西以及在西北的共产党，公开发表了对日宣战。

蒋的对手想通过这些攻击来削弱他的政治和军事基础。国民党、政府和军事机器建立在民族主义运动之上，尽管 1927 年之后它显示出更加保守的倾向，但仍然烙有早期反帝思想的印记。毕竟，所有政府和党的会议开始时均要宣读孙中山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通过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与妥协政策之间的对比，反差是惊人的。甚至那些理性上拥护这个政策、认为非常有必要免于与日本开战的人，也觉得在情感上很难接受它。

最让蒋介石担心的是对妥协政策的不满会影响其军队的士气和忠诚。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向他的军事将领们辩护这个政策。在对他的嫡系军官的私人讲话中，他试图消除反对妥协的情绪，坚称当中国准备就绪后他将进行抵抗。他经常告诫，过渡时期需要纪律和忠诚；但对于极其令人反感的妥协政策的执着，危及了他把中国统一在他的统治下的努力。

尽管如此，日本问题在中国政治中对双方都有利。当像在北方的冯玉祥、广东的陈济棠这些地方领袖可能攻击蒋对日的软弱政策时，蒋毕竟等同于中央政府。是南京而非唐山或广东，与东京有着正式的外交关系。因此，蒋可以经常把日本问题倒过来，指责其对手挑动内战，干着让日本人渔翁得利之事。随着那个 10 年的艰难逝去，这种情形尤其显著。在南京时代的早期，军阀主义的残余依然强大，南京政治保留了 20 世纪 20 年代的特征。尽管如此，1931～1932 年日本人的压迫，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威胁，以致要求对东京采取统一的、民族性的反应的压力，在各界均大为增加。福建事变的领导人和广东的将领们均陷入了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他们攻击蒋的政策，但他们自己无法逃脱破坏民族团结的责骂。到了 1937 年，甚至共产党——在来自莫斯科的某种压力之下——也认识到只有蒋介石才能成为一个有力的

“民族领袖”，只有一个民族的领袖才能为中国抵抗日本带来一些希望。不过，在这个 10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蒋介石没有能够利用这种情感。作为国际承认的中国领袖，他无法做出强硬的、公开的抗日声明（这可能会使他更受拥戴）而不激怒东京。

日本问题破坏了蒋为其政府创建一个新意识形态基础的努力。认识到共产党引发了意识形态的挑战，蒋和他的盟友们进行了几次尝试来对抗其威胁。蒋发起了他的“新生活运动”以提供一种保守、反共的意识形态；他通过其蓝衣社来玩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他的追随者崇尚一个铁腕人物或独裁者会把中国带入一个新时代的理念。这些主意鲜有成效。尽管国民党的核心成员拥护法西斯主义和独裁统治，但蒋没有能够把这种意识形态发展成为其政府的基础。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他的妥协政策。当蒋不经开战就把一大块中国领土交给了一个外敌时，他怎么会被捧为中国的希特勒或是中国的墨索里尼呢？当蒋似乎逃离南京来免于承担日本问题的责任时，人们如何来谈论一个铁腕人物或是独裁者呢？甚至就是那个“民族主义”的概念——现代世界中创建国家的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也往往是不利于蒋的。他处理外国威胁时的无能削弱了他的意识形态基础。

如果日本人被扼制住了或者他们的要求仅仅是可调和的，蒋的妥协政策在政治上的损害可能要小一些。但情形并非如此。日本人不是循着一条而是几条路线前行——在日本以及在中国，政党和军队的势力有时追求不同的目标。不过有许多人，像极端分子土肥原贤二（被西方在华媒体称为“满洲的劳伦斯”），希望所有调和的努力都失败。因此，蒋介石被夹在了日本人无休止的要求与中国人对日不断增长的民愤之间。他的声望直线下降。只是由于西安事变，并且由于蒋决定采取一种更加强硬的对日立场后，他才成为一个受拥戴的“民族领袖”。但这种新立场导致了他曾经竭力避免的灾难性的战争。

因而，日本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在 20 世纪 30 年代构成了中国政治活动的框架。南京在建国方面的每一次努力都受到了日本问题的影响。所以，这项研究将根据这一重要问题来考察南京时代的中国国内政治。我按年代顺序对这 10 年进行研究，讨论中国人对中日关系新危机的反应。在考察中国的背景时，我将分析三个关键群体的影响：第一种是南京政府及其领导者，第二种是像冯玉祥这样的地方领袖，第三种是独立的“民意”力量。

南京政府及其领导者：关键人物是蒋介石，他主宰南京政权，并经常在幕后指导其对日政策。南京政府被各种各样的政治派系所困扰；蒋似乎有意挑动他们互相争斗以维持他的政治控制。像 C.C. 系、蓝衣社以及政学系这几个派别，其个人都忠于蒋介石，而其影响力则源于他的支持。像其他与汪精卫和孙科有关的派系，具有某种独立于蒋的政治基础，并被视为他的对手。由于宋子文和孔祥熙与金融业和商业的紧密联系，他们也具有独立的政治势力，尤其是宋子文有时处于蒋的对立位置。不过，由于这两人是蒋的妻兄和连襟，他们的派系被视为忠于蒋。

日本观察家（及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政学系和汪精卫系是亲日的。东京把蓝衣社、宋子文和孙科看做是受诅咒的人；日本人也经常谴责 C.C. 系，尽管其倾向并不明朗。因此，日本问题变成了南京政治内讧中的主要因素。中日关系中的新危机将改变派系的平衡：为了实施其妥协政策，蒋介石不得不支持像汪精卫和政学系这些为日本人所接受的派系；但中国反日运动的爆发，可能会给认同妥协的政客们带来政治麻烦。

地方领袖：本项研究的第二个焦点是地方领袖，与独立的政治和军事政权有关的派系。像北方的冯玉祥、张学良和阎锡山，或是南方的粤系（包括胡汉民）和桂系这样一些人，自称是国民党的组成部分，却是蒋介石在党内的对手。其他还有像福建的反叛者这样的地方派系，以及建立了地方政权而想推翻南京和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所有这些派系都力图在南京政府之外保持一定

的独立性。

日本的在华活动——直接的和间接的——及南京的反应，成为地方与中央斗争中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在地方将领中有一个明显的分界。像粤系这样的南方派系，可以在离前线数百英里之遙悠然堂皇地痛骂日本帝国主义。而对于北方军阀来说，日本帝国主义不是一种空洞的威胁，它是一种严酷的现实。事实上，冯玉祥和张学良均发现其军事（及此后的政治）力量被日本人的直接行动所削弱。贯穿在这项研究中，我将分析影响地方与中央斗争的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性。

独立的民意力量：蒋的妥协政策面对着一群满怀仇恨的大众。在媒体上，从像胡适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子谨慎适度的论调，到新闻记者邹韬奋慷慨激昂的抗日呼声，舆论千差万别。学生示威、抵货运动和全国救亡组织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加剧了不信任群众运动的蒋的不幸。尽管这些民意的力量缺乏一种直接的军事和政治基础，但它们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变得越来越重要。我将要说明中日关系危机的发展是如何导致这些因素的增长的，主要的政治领袖对它们的活动是如何应对的，尤为重要的是，不断增长的民意的力量在中国政治中是如何起着更大的作用的。当蒋介石竭力压制这些新的力量时，其他人——最明显的是中共——则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而力图释放和引导这些力量。

例如，在考察中日关系中的特定事件时，我将试图总结媒体的反应，像学生会或救亡联合会这些民众团体的反应以及政治人物的应对。在某些情况下，当日本人要求逮捕具体的新闻记者和镇压具体的抗日团体时，他们自身成了关键角色。

通过对 20 世纪 30 年代中日关系发展中以上三个群体作用的分析，我希望对现代中国政治发展和国民党统治实质的认识提供新的见解。这个阶段中日本问题对中国政治是如此关键，只有这样的考察才能揭示出在蒋介石企图创建一个强大的政权时左右南京政府的离心和向心的力量。以前西方学术界一直未能对中日间